



青年抗敵決死隊



师文华 著

XIMENGHUI JUESIDUI LUNGAO



牺盟会决死队 論稿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牺盟会决死队 論稿

XIMENGHUI JUESIDUI LUNGAO

师文华 著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牺盟会决死队论稿 / 师文华著.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9.7

ISBN 978-7-203-06539-5

I. 牺… II. 师… III. 牺盟会—史料—研究—山西省
IV. K265.9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5153 号

牺盟会决死队论稿

著 者: 师文华

责任编辑: 蒙莉莉 魏 红

装帧设计: 清晨阳光(谢成)工作室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传真) 4956038(邮购)

E-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 太原市力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200 千字

印 数: 1-4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7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7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06539-5

定 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序 言

李立功

师文华同志所著《牺盟会决死队论稿》一书，是一部很有特点的党史研究著作。它不是就史写史，而是就史论理，以史引论，以论明史。它对抗战时期在三晋大地产生的牺盟会和决死队等山西新军，针对历史上一些同志的误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从理论上进行了研究和探讨，给人们以新的启示。我作为从牺盟会参加革命的一名老战士，读了这部书以后，感到特别亲切和欣慰。因为它不仅唤起了我对抗日战争时期那轰轰烈烈抗战动员局面和蓬蓬勃勃游击战争岁月的回忆，而且对牺盟会和决死队等山西新军历史活动的全貌和它的历史作用与意义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我认为值得向读者推荐此书。

牺盟会和决死队等山西新军，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在山西实践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不仅在山西抗战中曾经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在中华民族团结御侮、抗击外敌的历史中，也有独特的作用和研究价值。

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使民族矛盾日益加深，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寇深祸亟、举国一致要求抗日的形势下，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产生了要求抗日的政治倾向。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北方局根据阎锡山政治态度的变化，遵照中央政

治局瓦窑堡会议确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陆续派遣共产党员到山西，做争取阎锡山抗日的统一战线工作。先是由中共中央派遣彭雪枫同志以中共全权代表的身份来太原，向阎锡山解释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后又由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遣薄一波等同志以抗日活动家的身份到太原，推动阎锡山走联共抗日的道路。在抗日的基本前提下，我党终于与阎锡山形成了统一战线关系。正是由于有了统一战线关系，八路军才顺利开赴山西，派到山西的秘密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才合法地分布到各地发动群众，建立抗日团体，发展抗日武装，并逐步建立抗日政权，打开了山西团结抗战的局面。中共中央北方局直接领导的山西党的公开工作系统与阎锡山形成的特殊形式统一战线，就是山西抗日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山西特殊形式统一战线的“特殊”之处，就是推动和帮助阎锡山抗日的山西党的一批干部，不是以共产党代表的身份而是以抗日活动家的身份出现的。他们戴着“山西帽子”、说“山西话”，即在阎锡山当局担任某些军政公开职务，运用阎锡山的抗日言论、抗日口号和惯用的术语，灵活地执行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公开地、合法地发展抗日力量，改组牺盟会，建立决死队等山西新军，推动山西抗日斗争的发展。牺盟会和决死队等山西新军，与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密切配合，在党的山西地方组织的大力支持下，以八路军为坚强后盾，积极参加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为实现党中央关于在山西建立华北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支点的构想作出了重大贡献。

早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不久，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这根本的是因为有红军，其次则是阎锡山与我们结合起来。由于这两个力量的结合，将造成数百万人民的游击战争。”山西特殊形式统一战线的出现和团结抗战局面的开创，正好印证了毛泽东同志的预言。

统一战线本身存在着又联合、又斗争两个方面。在特殊形式统一

战线中，在抗日问题上，我们党与阎锡山的合作是真诚的，曾经以“坚决拥护阎司令长官抗战到底”的口号为号召；然而，当阎锡山在抗日这个基本前提上发生犹豫、动摇甚至倒退时，新派与旧派、新军与旧军之间固有的矛盾便突显出来，甚至发生政治或军事摩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也进行了必要的、有节制的斗争，斗争的目的是为了争取阎锡山抗日，以维持山西团结抗战的局面。

但是，由于牺盟会和决死队等山西新军的特殊性，开始曾有少数同志不了解其内幕，产生过一些误解。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打倒一大批老干部、实现篡党夺权的阴谋，掀起了一股所谓“揪叛徒”的妖风，把曾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同志诬蔑为“大叛徒集团的头子”，把曾在牺盟会和决死队担任过领导工作的薄一波等同志诬蔑为“刘少奇叛徒集团的成员”，使曾在牺盟会和决死队等山西新军中工作、战斗过的一大批老同志受到残酷的迫害，在政治上、思想上造成了更大的混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党中央恢复了牺盟会和决死队等山西新军的革命面目，肯定了它们的革命性质；党史、革命史、军史界的专家、学者们撰写了大量有说服力的论著，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种种谬论，论证了牺盟会和决死队等山西新军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澄清了人们许多糊涂的认识。师文华同志就是在吸收这些论著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一重大历史课题作了独立思考和深入研究，写出了《牺盟会决死队论稿》这部书。这部书对牺盟会和决死队等山西新军产生的历史背景、党的政治领导、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牺盟会和决死队等山西新军的革命性质、历史作用和经验教训等方面，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从理论上作了深刻论述和系统回答。它的独到之处是能使我们对这一重大历史事实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从思想深处得到明确的认识。

党史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对党的历史活动中本质性规律的揭示。我希望我们的党史工作者，在客观地记述党的历史活动的

同时，注重从理论上深刻揭示党的发展和党对革命事业实施领导的内在规律，写出更多更好的史论结合的党史著作，使读者能够从根本上领会和掌握党的历史经验，用以指导我们今天和今后工作的实践。

2008年9月

引 言

从1936年秋到1937年秋，在党的瓦窑堡会议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指引下，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在山西先后产生了牺牲救国同盟会和青年抗敌决死队（通称牺盟会、决死队^①），形成了一种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不久，毛泽东就指出：“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这根本的是因为有红军，其次则是阎锡山与我们结合起来。由于这两个力量的结合，将造成数百万人民的游击战争。”^②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的特点是：（一）薄一波等一批共产党人不是以共产党公开代表的身份与山西当局阎锡山合作，而是以抗日活动家的身份，在阎锡山的领导下，推动和帮助阎锡山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二）共产党人在阎锡山的领导机关和官办团体中担任领导职务，秘密接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领导，合法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三）在阎锡山领导的机关和官办团体中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适当变换词句，借用阎锡山的口号、法令和政策而付诸实施。对于阎锡山提出的抗日进步的口号和主张，坚决贯彻实行之；对其落后的、

^① 山西新军最早建立的是决死队，后来逐步发展壮大。本书把决死队作为山西新军的代表，包括了山西新军的各个部分。

^② 《在华北局势危急情况下应坚持游击战争》，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65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反动的主张和措施，则以其进步的口号抵制之。这种办法，当时曾被称之为“用阎锡山的面袋装我们的面”。（四）利用阎锡山的地位和他支持抗日的言论和措施，反对阎锡山集团中顽固势力的破坏和捣乱，维持与阎锡山联合抗日的关系。一句话，这种特殊形式统一战线的“特殊”之处，就是戴“山西帽子”，说“山西话”，灵活地、巧妙地实行共产党的抗日路线和主张。这是中共中央北方局适应华北抗日的形势和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的特点，在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精神过程中的一种成功的创造。由于这种创造的成功，中国共产党在与阎锡山合作的过程中，取得了合法地动员群众的条件，广泛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和战争动员工作；建立了由中国共产党参加创建和领导的特殊抗日武装——决死队等山西新军；掌握了大部分政权，初步实施了民主政治；参加了创建山地抗日根据地的斗争。这一切，为尔后八路军开赴山西，打开山西的抗日局面，为实现中共中央关于把山西建成华北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支点的构想，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关于这种特殊形式统一战线的作用，刘少奇在1938年8月18日给朱瑞并冀豫晋省委的指示信中曾经指出：“在山西，我们工作环境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在山西已经有了我们的武装，参加了一些地方的政府，并参加了统一的群众救亡运动，而这种参加是采取一种特殊的方式。你们在山西已经不是完全的在野党，军事、政治、民众运动以及各种政策法规等，你们都要过问，而且都应该负责；然而，你们在形式上和法律上都还是一个完全的在野党，在法律上正式的、公开的政治地位，你们还没有取得（这种情形，古今中外都没有前例的）。你们必须完全地认识这一个特点，并且根据这种特点而采取恰当的特殊的工作方式，然后你们的工作才能顺利地进行，否则是要在许多地方碰壁的。”除了八路军队伍、正式公开的党的干部和团体可以公开正式地进行领导外，“党只能采用特殊秘密的方式去指导他们。这是在山

西工作，尤其在发表党的文件时应特别注意的。”^① 1943年3月，刘少奇在总结抗战初期华北工作的经验时又指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种是河北的形式，另一种是山西的形式，山西的形式就是“与山西新派合作的形式”，即“通过新派及牺盟会建立根据地，建立武装新政权，实行三民主义，进行抗战。这种形式，也是值得研究的。因为它也能使我们、使革命前进一大步”^②。

然而，山西特殊形式统一战线局面的开创，不是径情直遂的。一开始，它不但受到了国民党中央和阎锡山集团中顽固势力的肆意诬蔑和坚决反对，而且在党内也出现过不同的认识。顽固势力的肆意诬蔑和坚决反对，是由于他们的阶级立场决定的，完全可以理解。至于共产党内部的不同认识，则是由于不善于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而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所致。

在山西特殊形式统一战线形成之初，有的同志认为牺盟会、决死队接受阎锡山的领导，政治面貌模糊，旗帜不够鲜明，不能体现党的领导。当时，北平救国会的一些人到太原后，就认为牺盟会应该归救国会领导。同时山西也有的同志认为牺盟会实际上是救国会，应该由山西工委领导。后来，也有个别党组织对牺盟会、决死队采取怀疑的态度。虽然历史已经证实，牺盟会、决死队的组织形式和历史活动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特殊重要作用，但仍有的同志长期感到不好理解。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打倒一大批党的领导骨干，实现篡党夺权的阴谋，更是对牺盟会、决死队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大肆进行诬蔑和陷害。他们诬蔑曾经领导过牺盟会、决死队工作的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同志是“大叛徒集团的头子”，诬蔑牺盟会、决死队的主要领导人薄一波等同志是“刘少奇叛徒集团的成员”，使大批曾在牺盟会、决死队工作和战斗过的老干部受到残酷迫害，不少人甚至被摧残致死，在政治上、思想上造成了极大

^① 《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一卷，334、335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2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混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拨乱反正工作的开展，邓小平明确指出：牺盟会、决死队的革命性质和历史功绩，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应予澄清”，遂使受到迫害的干部陆续得到平反昭雪。同时，军史、党史界对牺盟会、决死队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研究，写出了大量论著。这对澄清人们的糊涂认识起了重要作用。然而，要真正弄清这一历史现象的实质，尚需从理论上加以深入研究和讨论，不但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这样才能真正从政治上驳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种种诬陷，从思想上清除各种疑虑，消除各种偏见，使牺盟会、决死队等山西新军恢复其革命的面目，使山西特殊形式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得以发扬光大。为此，笔者写了一些文字，以期引起深入讨论和争鸣。

目 录

引言	1
一、牺盟会决死队产生的历史背景	
(一) 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形势与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1
(二) 瓦窑堡会议与中国共产党政治策略的转变	8
(三) 红军东征在山西产生的影响	20
(四) 阎锡山的特点及其政治态度的变化	27
二、牺盟会决死队的政治领导与理论指导	
(一) 刘少奇与北方党的工作的转机	33
(二) 中共中央北方局对牺盟会决死队的政治领导	37
(三) 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牺盟会决死队的理论指导	47
三、牺盟会决死队的性质	
(一) 牺牲救国同盟会的革命性质	63
(二) 决死队等山西新军的革命性质	82
(三) 关于牺盟会决死队性质的几点辩证	95
四、牺盟会决死队与旧政权的改造和抗日政权的建立	
(一) 中共中央关于改造旧政权的基本思想	113

(二) 从旧政权的改造到抗日政权的建立	116
(三) 抗日民主政权的发展和完善	121
五、牺盟会决死队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一)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华北战略支点的部署 与牺盟会决死队等山西新军的新任务	126
(二) 牺盟会决死队在开辟抗日根据地中的作用	129
(三) 具有突出特点的太岳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137
六、牺盟会决死队对党的又联合又斗争政策的运用	
(一) 又联合又斗争是同阎锡山建立统一战线的 需要	143
(二) 针对阎锡山的不同表现采取不同的策略	146
(三) 坚定地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	151
七、牺盟会决死队的反顽斗争及其主要经验教训	
(一) 阎锡山政治态度的右转与山西统一战线 危机的出现	158
(二) 中共中央对山西反顽斗争的指导	162
(三) 山西各地反顽斗争的逐步开展	166
(四) 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山西的表现与牺盟会 决死队等山西新军的反击	168
(五) 十二月事变的和平解决	173
(六) 牺盟会决死队等山西新军的主要经验教训	176
跋	187

一、牺盟会决死队 产生的历史背景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当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未形成之时，中共中央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的精神，指示薄一波等共产党人到山西，从1936年10月开始，与山西地方当局阎锡山逐步建立了一种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关系。薄一波等以抗日活动家的身份，接受阎锡山的邀请，先是掌握了牺盟会的实际领导权，后又创建了山西新军决死队，壮大了山西新派的力量。

山西牺盟会和决死队等山西新军的产生，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什么人灵机一动的产物，它是在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应运产生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中国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在山西相互斗争的结果。因此，它的产生有其充分的客观依据和必要的条件，有其必要性和可能性。研究这一问题，对于认识牺盟会、决死队和山西特殊形式统一战线的作用及历史经验，对于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都是十分必要的。

（一）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形势 与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中国人民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爆发于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的卢

沟桥事变之后，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却不是自卢沟桥事变开始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卢沟桥事变之前的几十年。

毛泽东曾经说过：“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①这个过程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就开始了，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表现得更为明显。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过程，就是这个过程中的主要内容之一。

日本原来是一个闭关自守的、落后的封建国家。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并且在西方列强的支持下，强烈地要求对外扩张，特别表现在对中国的侵略野心。1894年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签订的《马关条约》和1915年签订的《二十一条》，充分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扩张并以中国为基地而实现独霸世界的野心。这一点，在《田中奏折》中表现得最为明显。1927年7月25日，日本内阁总理兼外务大臣田中义一在《田中奏折》中将所谓对满蒙的权力视为“第一大关键”。所谓满蒙，即中国的东北、内蒙古和外蒙古。他说：“所谓满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外蒙古是也。广袤七万四千公里，人口二千八百万人，较我日本帝国国土大逾三倍，其人口只有我国三分之一。不惟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当世无其匹敌。我国因欲开拓其富源，以培养帝国恒久之荣华，特设南满洲铁道会社，借日、支共存共荣之美名，而投资于其地之铁道、海运、矿山、森林、钢铁、农业、畜产等业，达四亿四千余万元。此诚我国企业中最雄大之组织也。”^②田中认为：“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中小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③。可见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是称霸世界，而为了称霸世界，首先要灭亡中国，这个阴谋是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6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② 《田中奏折》，见《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主义侵华文件选辑》，92页，三联书店，1958。

③ 《田中奏折》，见《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主义侵华文件选辑》，94页，三联书店，1958。

由来已久的。

1929年下半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这次经济危机，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步伐。经过经济危机转入经济萧条的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摆脱经济危机造成的困境，一方面千方百计地加重盘剥本国的工人和农民；另一方面极力向外争夺殖民地，妄图把国内经济危机造成的损失转嫁到殖民地人民的头上。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各国为争夺原料、争夺市场、争夺资本输出的基地，展开了尖锐而激烈的斗争。在亚洲，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施侵略扩张的政策，乘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忙于内部事务而无暇东顾，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加紧“围剿”红军的机会，肆无忌惮地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从东北开始的。它先后制造了一系列的挑衅事件，作为武装进攻的借口。1931年7月，日本无端地挑起了分裂中朝两大民族关系的“万宝山事件”，8月又借口中村失踪，大造侵略中国的舆论和气氛，并把大量的军队开进了中国的东北。9月18日，日军蓄意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沟地区的一段桥梁，然后诬称中国军队有意“破坏”，命令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开炮轰击中国东北军的驻扎地沈阳北大营，19日占领沈阳城。接着，日本侵略军分兵占领辽阳、海城、营口、安东、四平、长春等重要城市。不到5天时间，中国的辽宁、吉林两省几乎全部被日本占领。嗣后，10月、11月间，日军又发动了对中国黑龙江省的进攻。短短3个月的时间，中国的东北三省、将近200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和3000万同胞，完全陷入了日军的铁蹄之下。

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能够轻而易举地夺取了中国的东北三省，主要是由于国民党蒋介石推行反共卖国政策造成的。而英美帝国主义当时的政治态度，对蒋介石起着决定的作用；蒋介石要建立和巩固他的政治统治，也离不开英美帝国主义的撑腰。当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的矛头对着中国东北的时候，一来还没有直接威胁到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二来英美帝国主义也想借助日本占领东北后向苏联进攻以牵制苏联，所以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行动，采取了怂恿的态度。这种态度直接影响着国民党蒋介石。面对日本调兵遣将、气势汹汹地准备发动侵略战争的危急形势，蒋介石

石不但不积极准备进行抵抗，反而继续其“反共”的反革命事业。1931年8月20日，蒋介石在南昌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按：指国民党反动派）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也不可。”^①正因为如此，当日本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后，虽然中国军队也想进行抵抗，但蒋介石却推行“不抵抗主义”的政策，指令中国军队与入侵的日本军队“不许冲突”，说什么“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事件扩大，绝对抱不抵抗主义”^②。11月30日，蒋介石又在南京发表演说，放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谬论。他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成功。”^③对于蒋介石来说，第一等要事是完成他的“剿共”事业。他的“攘外必先安内”说穿了就是“抗日必先剿共”。1933年4月，蒋介石又在南昌召集将领训话说：“抗日必先剿共，征之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患未剿清之先，绝对不能言抗日。”^④而对于抗日，蒋介石又是采取了依靠“国联”的态度。1931年9月22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南京市党员大会演讲中说：“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联公理之判断。”^⑤23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发表《告全国国民书》，声明：“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希望我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⑥。虽然国民党蒋介石想依赖国联，但国联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国家推行侵略战争的工具，根本不可能干预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12月，国联行政会通过决议，称日本在中国的东北有“剿匪权”，又决议组织以李顿为首的英、美、法、意、德五国代表组成的调查团到中国。调查团实际上并不承认中

① 《从“九一八”到“七七”国民党的投降政策与人民的抗战运动》，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② 《从“九一八”到“七七”》，见《党史资料》1954（7），9页。

③ 《从“九一八”到“七七”》，见《党史资料》1954（7），11页。

④ 《从“九一八”到“七七”》，见《党史资料》1954（7），20页。

⑤ 《从“九一八”到“七七”》，见《党史资料》1954（7），9页。

⑥ 《从“九一八”到“七七”》，见《党史资料》1954（7），10页。